

# 个体动机、制度约束与党团行为

——欧洲议会内激进左右翼党团的参与策略分析\*

董柞壮 张睿明

**内容提要:**欧洲议会内的激进左右翼党团分别采取了合作与对抗的行为策略。基于第六届欧洲议会至今的议员非投票参与行为、投票行为、议会内政策网络关系以及党团变更四类数据,可以发现激进左右翼党团成员在欧洲议会中表现出明显的行为反差。在党团内合作与跨党团合作上,激进左翼党团议员表现出更强的团结合作特征,激进右翼党团议员则表现出更强的消极对抗特征。个体层面的观念与利益两类动机,以及结构层面的各类制度约束能够解释这一差异。激进左翼议员偏好一体化和国际主义观念动机、欧盟层面的利益动机与稳定的国内选举基础、较少的议会制度约束构成良性循环,塑造了其合作行为;激进右翼议员偏好反一体化与民族主义观念动机、国内层面的利益动机与不稳定的选举基础、较强的议会制度约束形成“对抗性平衡”,使得激进右翼表现出“表面合作、本质分裂”的特征。

**关键词:**欧洲议会 党团政治 激进左翼党团 激进右翼党团

在欧洲议会中,激进左翼党团与激进右翼党团同为反体制势力,却为何采用了截然不同的行为策略与方式?前者倾向于政党内与政党间的合作,积极参与欧洲议会的事务;后者则热衷于对抗,在欧洲议会事务上表现出消极态度。既有研究讨论了欧洲议会内政党的普遍行为规律,对两类激进党团的行为差异逻辑及其原因却涉及较少。实际上,自1987年《单一欧洲法令》生效以来,欧洲议会权力的迅速扩张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sup>①</sup>其中,由主流的中左与中右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党团联盟

\* 本文系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项目(项目编号:ZB22BZ0331)的阶段性成果。文中错漏由作者负责。

<sup>①</sup> Berthold Rittberger, “The Creation and Empowerment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41, No.2, 2003, pp.203-225; Simon Hix and Bjørn Høyland, “Empowerment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6, 2013, pp.171-189.

(Grand Coalition)在推进欧洲议会权力扩张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sup>①</sup>正是这一庞大的支持一体化的党团联盟的存在,使得试图在欧洲议会内推动反一体化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sup>②</sup>然而,当前欧洲议会内主流党团的整体实力下滑,而边缘激进党团(Radical Political Group, RPG)特别是激进右翼党团<sup>③</sup>的实力却在不断增强。这一趋势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表现明显,并在2019年的选举中进一步巩固。<sup>④</sup>相较之下,激进左翼党团的实力虽无显著扩大,但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极其稳定的影响力。<sup>⑤</sup>可以预见,随着欧洲议会权力扩张及内部政党碎片化进一步增强,政党政治对欧盟外交政策的影响将更大。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相对于欧洲议会内的主流党团,边缘激进党团特别是激进左翼党团议员对华态度相对友好,<sup>⑥</sup>在涉及中欧关系的诸多重大问题上的态度更显温和。<sup>⑦</sup>因此,分析研判激进党团的利益偏好与行为策略,不仅有助于学界分析欧洲政党碎片化趋势下的欧盟政治演变,也有助于政策界进一步了解欧洲议会的党团政治并构建更加稳定成熟的中欧关系。

① 欧洲议会内议员按照意识形态归属于不同的党团,此处的党团就类似于国家层面的政党,但实际上欧洲议会内的各党团是由成员国内意识形态相近的政党组成的。本届即第九届欧洲议会内有七个党团,按照意识形态从左到右依次为:欧洲议会左翼党团(The Left Group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 GUE/NGL)、绿党党团(Group of the Greens/European Free Alliance)、社会民主党党团(Group of the Progressive Alliance of Socialists and Democrat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复兴欧洲党团(Renew Europe Group)、欧洲人民党党团(Group of the European People's Party)、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European Conservatives and Reformists Group)和认同与民主党团(Identity and Democracy Group)。由于党团名称变化,这一党团联盟可称为“人民—社会党团联盟”。参见 Amie Kreppel and Simon Hix, "From 'Grand Coalition' to Left-Right Confrontation: Explaining the Shifting Structure of Party Competition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6, Issue 1-2, 2003, pp.75-96。这两个议会内最大党团尽管在诸多议题领域的政策竞争倾向加剧,但在支持一体化与扩大欧洲议会权力方面却有着不断增强的共识。

② See Aleks Szczerbiak and Paul Taggart, eds., *Opposing Europe? The Comparative Party Politics of Euroscepticism (Volume 2): Comparative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31.

③ 激进右翼党团内的政党在分类命名上存在许多不同表述,在诸多文献中诸如“far”“radical”及“extreme”等用于描述此类政党的词被交替混用,而其实际含义并无太大变化。有关激进右翼政党定义的详尽讨论,参见 Cas Mudd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1-31。有关激进右翼(radical right)和极右翼(far right)政党区别的说明,参见 Matt Golder, "Far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9, 2016, pp.478-479。本文统一使用“激进右翼”的表述。

④ Oliver Treib, "Euroscepticism Is Here to Stay: What Cleavage Theory Can Teach Us about the 2019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28, No.2, 2021, pp.174-189.

⑤ Luke March, *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 Routledge, 2012, p.5。激进左翼党团“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色左翼联盟党团”(Confederal Group of the European United Left - Nordic Green Left, GUE-NGL)在2014年选举中也大有斩获。

⑥ Patrik Szczerle, Csaba Molnár and Péter Krekó, *The Specter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is Haunting Europe*, Political Capital Institute, 2021, p.11.

⑦ 其中的典型代表是激进左翼党团(GUE/NGL)的米克·华莱士(Mick Wallace)和克莱尔·戴利(Clare Daly)议员。相比之下,激进右翼党团中不乏此类议员,但其整体对华态度较为分裂。参见 Institute for Security & Developmental Policy, "Rhetoric of the Right: European Populist's View of China," 27 September 2017, <https://isd.p.eu/content/uploads/2017/09/2017-205-right-wing-populist-view-china.pdf>。

## 一 激进党团参与欧洲议会的策略反差

纵观历史,激进左右翼党团在欧洲议会内的实力此消彼长。1979年欧洲议会首次直选后,激进左翼共产主义者联盟党团(Communist and Allies Group)的规模一度远超过激进右翼势力,甚至高于意识形态居中的自由与民主党团(Liberal and Democratic Group),在议会内占据重要地位。然而随着两极格局瓦解和全球化深入推进,激进右翼党团的实力在最近十几年持续反弹,在本届议会的议席已接近激进左翼党团的两倍。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激进左右翼党团在议会内的参与行为似乎并无明显反差,两者都对推动欧洲一体化和强化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在一体化中的作用抱有积极的态度。第二届欧洲议会的欧洲右翼党团主席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曾表示:“建立一个政治上的欧洲的唯一合法目的是保卫具有欧洲特性和文化的欧洲人民的欧洲地区……保卫欧洲是所有欧洲人的首要责任,不能局限于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边界。”这与其女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的表态截然不同。当时的激进左翼共产主义者联盟党团主席乔瓦尼·塞尔维蒂(Giovanni Cervetti)也做过类似表态。<sup>①</sup>明显的差异出现于苏联解体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签署之后,激进左翼势力与北欧绿党联盟(Nordic Green Left Alliance)的结合缓和了其极端立场并增强了其政策兼容性,而激进右翼势力则向民粹主义转型,立场愈发偏激。总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和整个90年代是欧洲议会内边缘党团势力的整合重组阶段,而进入新世纪以后趋势逐渐平稳,稳定的党团内议员行为模式也逐步形成。<sup>②</sup>因此,自2004年第六届欧洲议会以来的经验数据反映出激进左右翼党团议会参与行为上的明显反差。两者在政治上都提出了与主流党团的不同主张,在策略上却截然不同,集中表现在议员非投票参与行为、投票行为、议会内政策网络关系(Policy Network)以及党团变更行为四个维度上。

### (一) 非投票参与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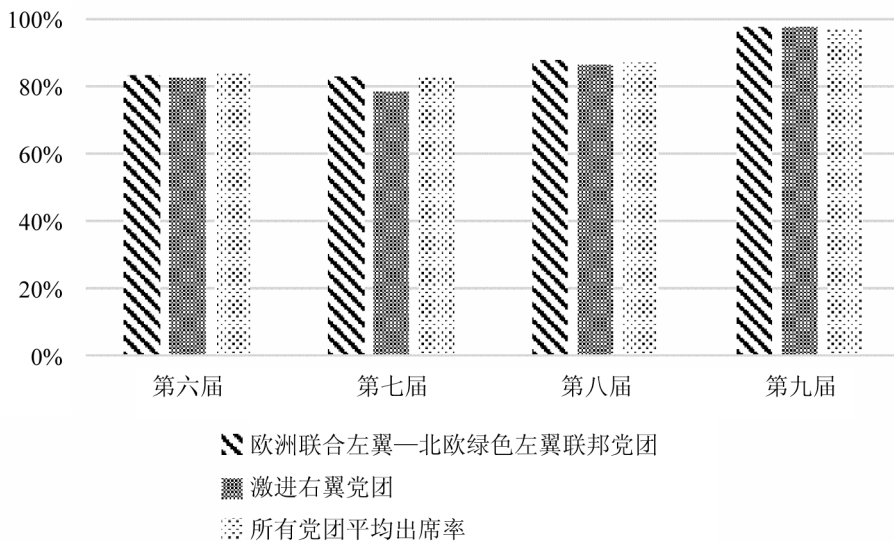
从议员出席情况来看,第六届至第九届欧洲议会中的激进左右翼党团议员总体上都保持了较高的出席率,与当届议会平均出席率水平非常接近,且部分呈现出逐届上

<sup>①</sup> 甚至在某些方面,当时的激进左翼党团似乎更具反抗性,比如其中的法国共产党。参见 Wolfram Kaiser, “Counter-Narrative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Far Left and Far Right Groups and European ‘Union’ in the 1980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Vol.30, No.1, 2022, pp.26-38。

<sup>②</sup> 从1989年激进左翼共产主义者联盟党团解体后,激进左翼势力开始了长时间的党团内部重组。同时期的激进右翼则因实力弱小仍然难成气候。

升的趋势,第九届议会平均出席率已接近 100%(见图 1)。这似乎表明激进左右翼党团议员都保持了较高的议会事务参与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公开数据仅统计了议员出席记名投票(Roll-Call Votes)的次数,而未统计在其他议会事务中的参与程度,如议会报告频率、议会提问频率等,因而还需进一步考察激进党团议员在其他议会活动领域的参与频率,才能全面把握激进左右翼党团议员在议会事务中的实际参与程度。

图 1 第六届至第九届议会激进左右翼党团议员议会出席率<sup>①</sup>



资料来源: <https://www.votewatch.eu>。<sup>②</sup>

以第八届欧洲议会为例。表 1 显示激进左右翼党团在该届议会中的具体参与情况,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议员在全体大会(Plenary Sessions)的发言次数;二是议员作为议会委员会报告起草人(Report Rapporteur)的次数;三是议员作为议会委员会针

<sup>①</sup> 第九届即本届议会尚未结束,出席率数据或有偏差,但从前几届议会同期出席率来看变动应该不大。此外,因激进右翼党团在欧洲议会内多次重组更名,此处统一标记为“激进右翼党团”。第六届和第八届议会中有两个长期存在的激进右翼党团,此处取均值。有关激进右翼党团的重组变动情形,后文将进一步讨论。本届议会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sup>②</sup> 因该网站已于 2022 年 6 月关闭,本文使用的此网站数据可通过 <https://pan.baidu.com/s/1yQteww6x2A2WgUIEa8--DA?pwd=6ort>(密码自动填充跳转)获取。当然,网站的数据也可以通过 [simon.hix@eui.eu](mailto:simon.hix@eui.eu) 联系其原负责人西蒙·希克斯(Simon Hix)教授获取,或者通过 [dzz@nankai.edu.cn](mailto:dzz@nankai.edu.cn) 或 [1813186@mail.nankai.edu.cn](mailto:1813186@mail.nankai.edu.cn) 联系本文作者获得。

对某一委员会报告意见起草人 (Opinion Rapporteur) 的次数;四是议员在议会中参与提出决议动议的次数 (Motions for Resolutions)。<sup>①</sup> 这四类参与行为较全面地涵盖了议员的主要立法和监督活动。总体来看,除全体大会发言次数外,该届议会内的激进左翼党团在其他三项参与行为次数方面均显著高于另外两个激进右翼党团,这充分证明了激进左翼党团在议会内的活动较右翼更为积极。

然而存在两种例外情况:第一,代表意识形态最右端的欧洲民族和自由党团的全体大会发言次数高于激进左翼党团,这与该党团内奥地利自由党 (Freiheitliche Partei Österreichs, FPÖ) 和法国国民联盟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议员较高的发言频率有关,其中前者议员的平均发言次数达到 961.5 次,后者为 572.36 次。可见,该两党议员的行为模式主要以“演说派”(Orator) 为主,即议员试图通过议会内公共发言抨击欧盟机构和反抗欧盟政策来引起注意,这是他们获取政治资本的重要方式,而在务实工作方面则缺乏兴趣。<sup>②</sup>

表 1 激进左右翼党团议会内具体参与情况

党团名称	全体大会发言次数	报告起草次数	意见起草次数	参与动议次数
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色左翼联盟党团 <sup>③</sup> (Confederal Group of the European United Left – Nordic Green Left)	405.14	1.73	2.53	93.88
欧洲自由和直接民主党团(总体) (Europe of Freedom and Direct Democracy Group)	324.61	1.15	1.10	40.24
欧洲自由和直接民主党团(仅意大利五星运动)	316.57	3.00	2.50	101.64
欧洲民族和自由党团 (Europe of Nations and Freedom Group)	410.14	0.32	0.46	4.11

资料来源: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portal/en>, 统计次数为第八届欧洲议会期内该党团(或党团内政党)所有议员发言次数的人均值,包括口头发言和书面发言两类。

<sup>①</sup> 有关欧洲议会议事程序规则(Rules of Procedure)在这四类行为上的具体规定,可参见议事规则第 171 (11)、204 条(全体大会),第 55 条(委员会报告起草),第 56、57 条(委员会报告意见起草),第 132、136、139、144 条(决议动议)。除此四类之外的其他参与行为本文未做统计。

<sup>②</sup> See Nathalie Brack, *Opposing Europe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Rebels and Radicals in the Chamber*, Springer, 2018, pp.89–94.

<sup>③</sup> 事实上该党团已于 2021 年 1 月更名为“欧洲议会左翼党团”(The Left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 GUE/NGL),此处暂用原名。

第二,作为激进右翼欧洲自由和直接民主党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大利五星运动党(Movimento 5 Stelle, M5S)占据该党团内近三分之一的席位。从表2数据来看,五星运动党议员的行为模式却同该党团的大部分成员格格不入:他们表现出与激进左翼党团成员相同甚至更高的议会参与度。从政策主张看,该党极为重视环境保护,且在部分经济和社会议题上持左翼立场,在同性婚姻和移民问题上又与其他极右翼政党保持一定距离。鉴于其较强的疑欧立场,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后,意识形态左翼的绿色/欧洲自由联盟党团(Greens/European Free Alliance, Greens/EFA)和居中的欧洲自由和民主联盟党团(Alliance of Liberals and Democrats for Europe, ALDE)相继拒绝接纳其作为新成员,使其最终勉强与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英国独立党建立联盟。五星运动党议员参与议会事务较为积极,与大部分激进左翼党团议员类似,尽管疑欧立场较强,却对议会各项工作保持积极和务实的态度,希图发挥政策影响,具有“实务派”(Pragmatist)的特征。<sup>①</sup> 相较之下,该党团的其他议员以及欧洲民族和自由党团的绝大多数议员均可被视作“缺席派”(Absentee),即长期保持对议会内事务的低参与度(见表2)。

表2 激进左右翼党团议员分类<sup>②</sup>

党团名称	缺席派	党团内 比例/%	演说派	党团内 比例/%	实务派	党团内 比例/%
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色 左翼联盟党团	3	5.77	4	7.69	31	59.62
欧洲自由和直接民主党团 (总体)	9	21.95	15	36.59	9	21.95
欧洲自由和直接民主党团 (意大利五星运动)	0	0.00	1	2.44	8	19.51
欧洲民族和自由党团	12	32.43	18	48.65	2	1.31

资料来源: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portal/en>。部分议员不能明确划入以上类别,因而未列入统计范围。

<sup>①</sup> 参见 Nathalie Brack, *Opposing Europe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Rebels and Radicals in the Chamber*, pp. 96-103。由于实务派与参与派(Participant)的界限较难划分,本文权且忽略将后者作为一种行为模式分类。缺席派指的是在全体大会口头和书面发言次数远低于平均值,其余三项贡献为零。演说派指的是在全体大会口头和书面发言次数大于200,其他贡献几乎为零,且参与动议次数多于缺席派议员。实务派指的是对全体大会贡献较多,大于100且小于200,而报告和意见起草次数和在3次及以上。其他议员因不符合上述标准,所以没有进行明确分类。

<sup>②</sup> 事实上,第六届、第八届和第九届议会的议员参与情况和分类也呈现出与表1和表2类似的特征。

## (二) 投票参与行为

考察激进左右翼党团议员议会参与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党团的聚合度(group cohesion),也就是议员投票行为的一致程度。表3反映了第六届至第九届议会激进左右翼党团的聚合度情况,数值越接近1表示党团投票越团结。由表3可见,激进左翼党团长期以来均保持较高的党团内投票一致性,尽管相较主流党团大多在90%及以上的聚合度而言仍相对较低。作为对比,激进右翼党团在议会中的投票一致性相当低,长期以来仅保持在50%至60%的水平。在第六届和第八届议会各自包含的两个激进右翼党团中,第六届的独立与民主党团(Independence/Democracy, IND/DEM)的聚合度仅为47%,第八届的欧洲自由和直接民主党团的聚合度仅为46%。考虑到大多数议员特别是激进党团内的议员对其所在国内政党的极高忠诚度,<sup>①</sup>激进右翼党团较低的聚合度主要是由于同一党团内各国政党存在较大分歧。<sup>②</sup>

表3 激进左右翼党团聚合度

党团名称	第六届	第七届	第八届	第九届
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色左翼联盟党团	0.85	0.79	0.82	0.87
激进右翼党团	0.62	0.49	0.56	0.63
所有党团平均聚合度	0.81	0.83	0.80	0.86

资料来源: <https://www.votewatch.eu>, 激进右翼党团聚合度在第六届和第八届取均值, 本届议会数据截至2021年12月。党团聚合度采用希克斯等人提出的“一致指数”(Agreement Index)计算, 其

公式为:  $AI_i = \frac{\max(Y_i, N_i, A_i) - \frac{1}{2} \{ (Y_i + N_i + A_i) - \max(Y_i, N_i, A_i) \}}{Y_i + N_i + A_i}$ , 其中  $Y_i$  表示党团  $i$  中的同意票数,  $N_i$  表示反对票数,  $A_i$  表示弃权票数。<sup>③</sup>

具体而言,表4显示在历届议会中,激进左右翼党团表现出最高和最低契合度的5个不同政策领域。对于左翼而言,农渔业问题和宪政与机构间关系事务常常是分歧所在,而社会经济、性别平等和环保卫生领域则形成了稳定的共识。对于右翼而言,不稳定的分歧远多于稳定的共识,但在公民权益、法律和内政事务以及宪政与机构间关系事务两个领域,右翼的共识相对比较稳定,然而其聚合度仅仅与左翼党团的最低契

<sup>①</sup> Monika Mühlböck, “Linking Council and European Parliament? Voting Unity of National Parties in Bicameral EU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20, No.4, 2013, p.576.

<sup>②</sup> 截至2021年12月,本届议会激进左翼党团内各国政党的平均投票忠诚度高达90.61%,激进右翼党团仅为67.64%。

<sup>③</sup> Simon Hix et al., *Democratic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91.

表4 激进左右翼党团不同议题领域聚合度

		第六届	第七届	第八届	第九届
激进左翼党团	聚合度低	议会内部规则(0.4);文化与教育(0.74);渔业(0.76);工业、科研与能源(0.76);农业(0.77);宪政事务和机构间关系(0.77)	议会内部规则(0.66);工业、科研与能源(0.7);农业(0.7);区域发展(0.71);宪政事务和机构间关系(0.72)	农业(0.71);宪政事务和机构间关系(0.76);预算(0.76);交通与旅游(0.77);内部市场和消费者保护(0.79)	渔业(0.63);外交及安全事务(0.77);宪政事务和机构间关系(0.77);预算(0.82);国际贸易(0.85)
	聚合度高	内部市场与消费者保护(0.94);就业与社会事务(0.94);发展(0.94);国际贸易(0.93);性别平等(0.92);环境与公共卫生(0.92)	国际贸易(0.87);请愿(Petitions)(0.86);就业与社会事务(0.86);环境与公共卫生(0.86);性别平等(0.84)	性别平等(0.91);环境与公共卫生(0.88);议会内部规则(0.87);发展(0.86);就业与社会事务(0.86)	发展(0.98);文化与教育(0.96);性别平等(0.96);环境与公共卫生(0.94);工业、科研与能源(0.93)
激进右翼党团	聚合度低	司法事务(0.37);国际贸易(0.39);农业(0.4);议会内部规则(0.41);渔业(0.43)	文化与教育(0.38);就业与社会事务(0.41);请愿(0.41);内部市场与消费者保护(0.42);交通与旅游(0.43)	农业(0.57);请愿(0.59);经济与货币事务(0.59);发展(0.6);法律事务(0.61)	外交与安全事务(0.53);发展(0.55);地区发展(0.56);经济与货币事务(0.57);内部市场与消费者保护(0.57)
	聚合度高	宪政事务和机构间关系(0.58);文化与教育(0.56);经济与货币事务(0.54);预算(0.54);请愿(0.52)	议会内部规则(0.69);预算控制(0.6);预算(0.52);工业、科研与能源(0.52);公民权益、法律与内政(0.51);宪政事务和机构间关系(0.51)	宪政事务和机构间关系(0.73);公民权益、法律与内政(0.71);就业与社会事务(0.71);预算控制(0.7);预算(0.7)	议会内部规则(0.97);交通与旅游(0.82);宪政事务和机构间关系(0.75);公民权益、法律与内政(0.75);农业(0.7)

资料来源: <https://www.votewatch.eu>, 第六届的激进右翼党团指的是独立与民主党团(IND/DEM), 第八届指的是欧洲民族和自由党团(ENF)。本届议会数据截至2021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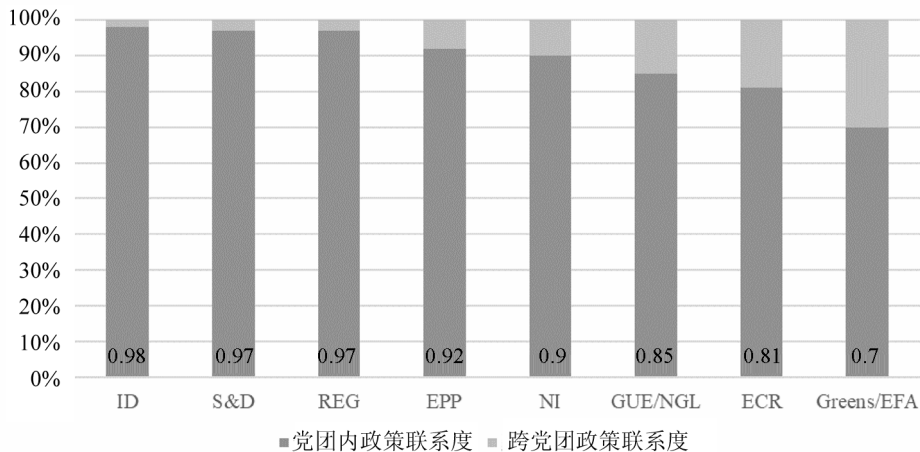


合度水平相当。这实际上反映了两派党团内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核心政策诉求:对于左翼政党而言,社会平等和环境保护是其重要诉求,而一定程度的疑欧主义又使其对欧盟机构和制度的态度相对分裂;对于右翼政党而言,“身份政治”是其政治口号,极力反对欧盟更是其团结选民的重要立场标签。这些特征在跨国层面的议会投票行为中得到较为清晰的体现。

### (三) 政策网络关系

除党团聚合度外,另一个考察激进左右翼党团议会参与行为的维度是议员的政策网络关系(Policy Network)。由于欧洲议会乃至整个欧盟极强的共识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属性,不同党团的议员为推进自身政策议程必须进行跨党团与跨国交涉谈判,通过相互妥协达成最终共识。在这一过程中,那些积极开展议会内交涉谈判的议员往往都具有更强的政策网络关系和政策通达度(Connectedness),也往往具有更强的议会参与意愿和合作精神。图2显示了第九届议会内所有党团的政策网络关系水平。

图2 第九届欧洲议会各党团政策联系度<sup>①</sup>



资料来源: <https://www.votewatch.eu>。

可以看到,激进右翼认同与民主党团(Identity and Democracy, ID)的政策网络关系绝大多数都局限于该党团内部,外部联系仅占到约2%。相比之下,激进左翼党团

<sup>①</sup> S&D为社会民主党党团,REG为复兴欧洲党团,EPP为欧洲人民党党团,NI为无党团议员。图中数据截至2020年9月。此处联系度为政策网络中的通达度,可通过ucinet软件进行计算得出结果。

(GUE/NGL) 的外部政策联系高达 15%, 仅次于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 (ECR) 和绿党党团 (Greens/EFA)。考虑到欧洲左翼党团 (41 席) 相对于认同与民主党团 (73 席) 更小的规模, 这更能说明相较于激进右翼势力, 欧洲议会内的激进左翼势力对于跨党和跨国政策合作明显保持了更为积极和开放的态度, 对于寻求共识而不是对抗更感兴趣。此外, “欧洲投票观察” (VoteWatch Europe) 进行的另一项有关本届议会议员政策网络关系的调查显示, 激进左翼党团有 12 人被认为具有较强的跨党团与跨国政策网络关系, 相比之下, 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有 13 人, 绿色党团有 8 人, 而认同与民主党团则无一人入选。值得关注的是, 无党团议员中也有 4 人入选, 而他们全部来自曾在上届议会中加入欧洲自由和直接民主党团的意大利五星运动党。<sup>①</sup>

激进左翼党团更强的议会内政策网络关系推动了其自身的政策议程, 但同时也缩小了其为主流党团的立场差异。表 5 显示了第七届至第九届议会中激进左翼党团与三大主流党团的投票契合程度。由此可见, 激进左翼党团整体上与主流三大党团有着更高的投票契合度, 平均在一半以上的情况下都能做出一致的选择。相比之下, 激进右翼党团与主流三大党团的投票契合度则很少超过 50%。这一方面表明激进右翼党团议员的立场可能过于极端, 另一方面则表明这些议员缺乏与主流党团的沟通与合作的意愿。

表 5 第七届至第九届议会中激进左右翼党团与主流党团投票契合度

议会届数	激进左翼党团			激进右翼党团		
	S&D	ALDE/REG	EPP	S&D	ALDE/REG	EPP
第七届	60%	50%	44%	45%	48%	56%
第八届	61%	50%	40%	27%	26%	30%
第九届	72%	65%	52%	33%	36%	45%

资料来源: <https://www.votewatch.eu>, 表中第八届激进右翼党团指的是欧洲民族和自由党团。欧洲自由和直接民主党团的对应比例与之非常接近。本届议会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 (四) 党团变更行为

最后一个考察激进左右翼党团议会参与的维度是议员的党团变更情况 (见表 6)。一般而言, 党团变更分为两种: 第一, 议会届中变更; 第二, 议会换届时变更。后者通常是因为该党团未能在新一届议会召开时成功召集 (Failure to Reconvene, FTR) 所致。

<sup>①</sup> VoteWatch Europe, “Which MEPs are the Best Networkers/Hubs of Policy Shaping?” 22 September 2020, <https://www.votewatch.eu/blog/epp-members-connect-across-national-lines-while-the-left-to-the-centre-prefer-cross-group-cooperation/>.

表 6 第六届至第九届议会激进左右翼党团变动情况

	激进左翼阵营	激进右翼阵营	
第六届	欧洲联合左翼—北欧 绿色左翼联盟党团	欧洲民族联盟党团 (Union for Europe of the Nations Group, UEN)	独立与民主党团 “身份、传统与主权”党团 (2007年1月至2007年11月存在)
第七届	欧洲联合左翼—北欧 绿色左翼联盟党团	欧洲自由与民主党团 (Europe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Group, EFD)	
第八届	欧洲联合左翼—北欧 绿色左翼联盟党团	欧洲自由和直接民主党团 (EFDD)	欧洲民族和自由党团 (2015年6月成立)
第九届	欧洲议会左翼党团 (2021年1月更名)	认同与民主党团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前述内容整理。

纵观历史,右翼党团的重组变更频率显著高于左翼党团。以第六届议会中仅短暂存在数月的激进右翼“身份、传统与主权”党团 (Identity, Tradition, Sovereignty, ITS) 为例,该党团内议员在其职业生涯中的党团变更次数竟占前六届议会所有党团变更总数的10%。<sup>①</sup> 在第八届议会中情形同样如此。议会中最稳定的两个党团分别是激进左翼党团 (GUE/NGL) 和绿色党团,两者不仅没有损失议员,反而各自从其他党团接纳了一名新议员。相比之下,右翼阵营议员的党团间变换更加复杂。欧洲自由和直接民主党团中的15名议员先后脱离本党团而选择加入其他党团,其中激进右翼欧洲民族和自由党团有5人,中间派欧洲自由和民主联盟党团有4人,中右翼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有3人,与此同时也有7人选择加入该党团,其中6人来自欧洲民族和自由党团。而欧洲民族和自由党团在损失上述6名议员的同时,还有1人倒戈加入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此外,意识形态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党团也损失了9名议员。<sup>②</sup> 激进右翼党团相较左翼更为频繁的党团变更行为再次印证了其内部较低的团结程度,反映出其内部

<sup>①</sup> Aaron Martin, “Party Group Collapse and Strategic Switching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Vol.22, No.3, 2021, pp.521-544.

<sup>②</sup> Robert Schuman Foundation, “Review of the 8th Legislatur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23 April 2019, <https://www.robert-schuman.eu/en/european-issues/0512-review-of-the-8th-legislature-of-the-european-parliament>.

议员偏好和动机的异质性。但从另一方面看,正如希克斯(Simon Hix)和诺瑞(Abdul Noury)指出的,大部分党团变更行为都是由边缘、影响力弱的党团向核心、影响力强的党团靠拢,且议员自身的意识形态趋同很可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sup>①</sup> 这表明,部分激进右翼议员也通过变换党团归属方式,采取了一种更为务实的议会内参与行为。<sup>②</sup>

总体来看,基于对激进左右翼党团非投票参与行为、投票行为、政策网络关系和党团变更行为四个维度上的综合比较可见,无论是党团内还是跨党团合作,左翼党团议员总体上表现出更为务实、团结与寻求合作的参与态度,而右翼党团议员则更多表现出消极、反抗和投机性的参与行为。

## 二 激进左右翼党团行为的解释框架

激进左右翼党团的反差行为是个体偏好与结构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欧洲议会因其作为跨国政党活动的平台及其直选性质的特点,容纳了不同类型的政党。不同的政党在意识形态、国内政治基础上的区别以及面临的制度环境差异,塑造了各自的策略偏好。

### (一) 个体与结构两类视角

在解释激进党团的行为差异时,既有研究关注了欧洲议会内的党团政治问题,探讨了各类激进党团的演变发展、内部结构、成员行为模式等。<sup>③</sup> 按照视角的差异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从个体的疑欧程度出发讨论激进党团的行为模式。例如布拉克(Nathalie Brack)将欧洲议会内右翼疑欧政党议员行为的模式分为四类:缺席派、演说派、实务派

<sup>①</sup> See Simon Hix and Abdul Noury, "Power versus Ideology: Political Group Switching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Vol.43, No.4, 2018, pp.551-594.

<sup>②</sup> 然而也有研究指出,激进右翼议员的此类变更党团行为不过是为了服务国内利益,向国内选民和主流政党展示自身的“可兼容性”,同时与外国极端右翼政党拉开距离。参见 Duncan McDonnell and Annika Werner, "Respectable Radicals: Why Some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Forsake Policy Congruenc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25, No.5, 2018, pp.747-763.

<sup>③</sup> 张磊:《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在欧洲议会中的博弈——欧洲议会党团凝聚力探析》,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3期,第111-129页;张磊:《欧洲议会中的党团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Amie Kreppel,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Supranational Party System: A Study in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Simon Hix, Abdul G. Noury and Gérard Roland, *Democratic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Simon Hix and Bjørn Høyland, "Political Behaviour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in Shane Martin, Thomas Saalfeld and Kaare Strøm,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egislative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591-608.

和参与派, 四者依次对应由低到高的议会参与程度。<sup>①</sup> 瑟温特(Ariadna Servent)的分类则是以较低程度到较高等度的疑欧立场来确定党团内议员的参与程度。由于欧洲议会内的主要疑欧党团正是激进左翼和右翼两个边缘党团, 而左翼党团议员的疑欧程度较右翼党团更低, 故而前者表现出更高的议会参与度。<sup>②</sup> 与此同时, 议会各党团对激进右翼势力采取的“隔离政策”(Cordon Sanitaire)也限制了极端疑欧右翼势力的议会参与。<sup>③</sup> 然而, 此类研究在区分和解释激进党团内部议员行为模式的同时, 对于疑欧主义立场的强弱二分法的区隔过于简单, 无法阐明激进左右翼党团政治参与立场的核心差异, 同时以疑欧主义立场这一单一维度解释两派党团议员的行为差异过于片面, 忽略了对动机的考察。

另一类解释则是结合了个体因素与结构因素解释党团的行为。上述研究大多基于斯特罗姆(Kaare Strøm)提出的政党行为模式分析框架,<sup>④</sup>在动机层面分析选票、职位和政策影响三个维度, 在制度层面则主要讨论政党组织结构、国内选举制度和政府参与情况、欧盟层面的制度约束等。<sup>⑤</sup> 此类研究的对象是欧洲议会内的全部政党而非

---

① Nathalie Brack, “Euro-scepticism at the Supranational Level: The Case of the ‘Untidy Right’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51, No.1, 2013, pp.85-104; Nathalie Brack, “The Roles of Euro-sceptic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EU,”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36, No.3, 2015, pp.337-350; Nathalie Brack, *Opposing Europe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Rebels and Radicals in the Chamber*, 2018.

② 在本届欧洲议会中即欧洲议会左翼党团(The Left Group in European Parliament)以及身份和民主党团(Identity and Democracy Group)。其他党团中也包含部分疑欧政党, 但在党团内影响力受限。未加入党团的无党团议员(Non-Inscrits)大多也有疑欧倾向, 但其影响力同样不大。

③ Ariadna Servent and Lara Panning, “Euro-sceptics in Trilogue Settings: Interest Form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42, No.4, 2019, pp.755-775。其他部分基于疑欧主义维度考察党团、政党和议员欧洲议会政治参与行为的研究, 如 Aleks Szczerbiak and Paul Taggart, eds., *Opposing Europe? The Comparative Party Politics of Euro-scepticism (Volume 2): Comparative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Benedetta Carlotti, *Patterns of Opposition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pposing Europe from the Inside?* Springer Nature, 2020。

④ Kaare Strøm, “A Behavioral Theory of Competitive Political Par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4, No.2, 1990, pp.565-598。

⑤ Simon Hix, “Parliamentary Behavior with Two Principals: Preferences, Parties, and Voting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6, No.3, 2002, pp.688-698; Thorsten Faas, “To Defect or not to Defect? National, Institutional and Party Group Pressures on MEP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for Party Group Cohesion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42, No.6, 2003, pp.841-866; Simon Hix, “Electoral Institutions and Legislative Behavior: Explaining Voting Defection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World Politics*, Vol.56, No.2, 2004, pp.194-223; Christel Koop, Christine Reh and Edoardo Bressanelli, “When Politics Prevails: Parties, Elections and Loyalty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57, No.3, 2018, pp.563-586; Simon Hix and Abdul Noury, “Power versus Ideology: Political Group Switching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Vol.43, No.4, 2018, pp.551-594。

专门关注激进党团的行为。<sup>①</sup>实际上,有关欧洲议会党团议员行为的普遍逻辑未必完全适用于激进左右翼党团。因此,有必要基于欧洲议会激进左右翼党团内政党、议员的不同组成以及其可能面临的不同形式的制度约束,更为细致和全面地考察其行为逻辑和背后动因。此类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并未有效区分选票、职位、政策影响等利益动机与意识形态等观念动机的作用,且对于观念动机与制度约束或激励作用的联系未给予足够重视。实际上,区分利益动机和观念动机有助于更加明确地识别激进左右翼党团议员在议会内的行为差异及其动因。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考察了激进左翼和右翼政党在欧洲各国政治中的起源与演变,<sup>②</sup>对两类政党在跨国层面特别是欧洲议会中的参与情况也有所关注,<sup>③</sup>然而相关研究并未深入比较两者的行为模式,也未能形成解释激进左右翼党团行为差异的分析框架和因果路径。在此基础上有待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在激进左右翼党团参与欧洲议会事务的过程中,两者的参与方式有何差异及其原因是什么?

## (二) 激进左右翼党团的行为逻辑

在分析欧洲议会内党团的行为时,既有研究大多聚焦影响其议员行为模式的普遍因素,而对于其中具有特殊性的激进左右翼党团缺乏讨论。事实上,激进党团与主流党团和政党相比具有显著差异,包括党团总体偏小的规模、较为极端的立场、在国内政治中的边缘地位,以及在欧洲议会作为“次等国内选举”(Second-Order Elections)中的

<sup>①</sup> Christian Jensen and Jae-Jae Spoon, "Thinking Locally, Acting Supranationally: Niche Party Behaviour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49, No.2, 2010, pp.174-201; Richard Whitaker and Philip Lynch,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and Actions of Eurosceptic Group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Pragmatism, Principles and Publicity,"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49, No.2, 2014, pp.232-263.

<sup>②</sup> 有关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研究,可参见王聪聪:《比较视野下的欧洲激进左翼政党选举支持探析》,载《欧洲研究》,2017年第3期,第57-73页;林德山:《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现状及变化评介》,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5期,第130-138页;Luck March and Cas Mudde, "What's Left of the Radical Left? The European Radical Left After 1989: Decline and Mutation,"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Vol.3, No.1, 2005, pp.23-49。有关欧洲激进右翼政党研究,可参见张莹:《“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回归:当今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崛起》,载《法国研究》,2013年第2期,第85-89页;贾文华:《“次等选举”的右倾化——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与影响》,载《欧洲研究》,2014年第5期,第51-70页;史志钦,刘力达:《民族主义、政治危机与选民分野——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的崛起》,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2期,第113-123页;田野:《全球化、要素禀赋和政党重组——对欧洲民粹主义浪潮的一项解释》,载《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10期,第43-54页。

<sup>③</sup> 段明明:《欧洲极右翼政党对欧盟的“政治利用”策略透析——以法国国民阵线为例》,第41-56页;王明进:《欧洲议会疑欧主义政党的崛起及其对欧盟政治的影响》,载《国际论坛》,2015年第4期,第24-29页;张莉、徐家林、单超:《欧洲联合左翼联盟/北欧绿色左翼的政治主张及其凝聚力》,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5期,第84-89页;刘春元、石方方:《欧洲危机与欧洲左翼党的主张——欧洲左翼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综述》,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5期,第84-89页;游楠、史志钦:《当前欧洲议会左翼党团的政治表现与影响》,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9年第4期,第156-165页;殷佳章、房乐宪:《极右翼政党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路径:一种后功能主义视角》,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第77-87页;Duncan McDonnell and Annika Werner, *International Populism: The Radical Right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优势地位等,<sup>①</sup>就此区分出国际—国内、观念—利益和个体—结构这三重维度,有助于理清其在欧洲议会内的行为逻辑。

其一是在身份上存在国际与国内的双重属性。欧洲议会议员兼具跨国身份和国内身份双重属性,不仅需要遵循议会党团的行为要求,也受到国内政党和选民的制约。因此,欧洲议会的议员对其跨国与国内双重身份的界定与排序,会影响其在议会中的具体参与行为。

其二是在动机上存在利益动机与观念动机两类行为动因。对欧洲议会议员的参与行为主要基于理性选择的假设,即各类行为的实施均有明确的预期收益,包括获得选票、职位和政策影响等不同方面。然而,判断何种预期收益更加重要却由其观念所塑造,即在利益动机之外也存在基于身份的观念动机,对议员的行为产生影响。

其三是存在个体特征与结构制约两类行为机制。在个体身份与偏好之外,国内制度环境、欧盟层面的制度环境等外部结构也影响了激进党团成员的行为。因为国内选举制度和选举周期、国内政党结构等均对议员的行为产生普遍影响。<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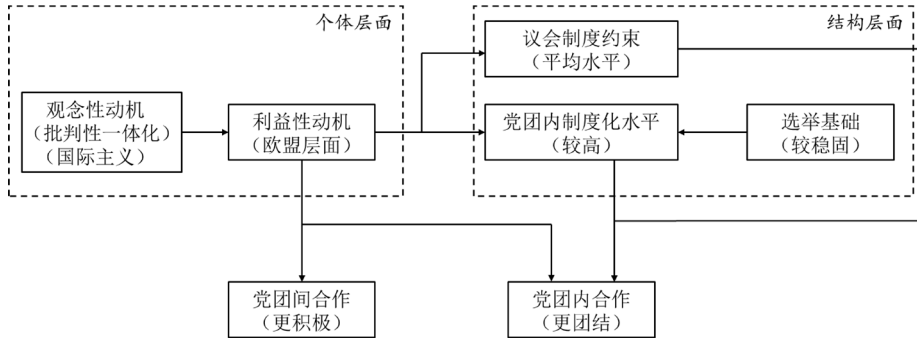
在将个体特征与结构制约相结合后,可以给出解释激进左右翼党团行为差异的逻辑链条。图3为激进左翼党团议员行为模式的解释框架。在个体层次上,受支持一体化与国际主义观念动机影响,支持欧盟的利益动机带来更为积极的党团间合作态度,即更乐意与其他党团进行合作以推动其政策影响,同时也提高了党团内部的聚合度,因为追求自身在欧盟层面的利益需要一个凝聚力强的党团作为支持。在结构层次上,激进左翼议员偏好欧盟层面利益,一方面促进党团内制度化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避免议会内制度对于强疑欧主义势力的强烈反应,促进激进左翼的党团内合作水平的提升。总体而言,激进左翼议员个体特征与制度制约形成了良性的互动闭环。由图3可见,此类党团行为最终取决于观念动机和选举基础两个外部输入性因素,而这两类因素总体上较为稳定。

---

<sup>①</sup> 诸多研究表明边缘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似乎更具优势。参见 Simon Hix and Michael Marsh, “Punishment or Protest? Understanding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9, No.2, 2007, pp.495–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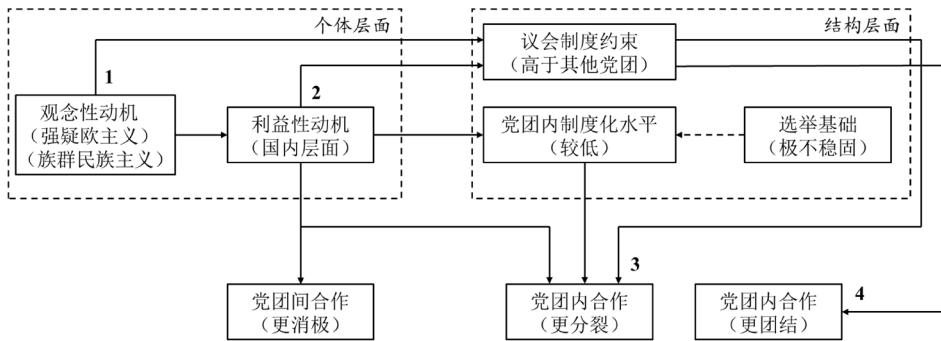
<sup>②</sup> 参见 Monika Mühlböck, “National Versus European: Party Control Over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35, No.3, 2012, pp.607–631; Emanuel Coman, “Reassessing the Influence of Party Groups on Individual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32, No.6, 2009, pp.1099–1117。部长理事会的作用较为微弱,故并未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参见 Monika Mühlböck, “Linking Council and European Parliament? Voting Unity of National Parties in Bicameral EU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20, No.4, 2013, pp.571–588。

图3 激进左翼议员行为动因解释框架



注:图由作者自制。

图4 激进右翼议员行为动因解释框架



注:图由作者自制。

图4展示了激进右翼党团议员行为模式的解释框架。在个体层次上,此类党团具有强疑欧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的观念动机,导致其对欧盟层面利益的漠视,在寻求欧盟层面的跨党团合作上并不积极,在党团内合作的问题上同样如此。在结构层次上,注重国内层面的利益动机不利于党团内制度化水平上升,即使对于选举基础稳固的老牌激进右翼政党也是如此,故党团内制度对于促进议员的合作影响甚微。强疑欧主义触发了议会内制度的警惕,导致激进右翼政党在议会内面临更严苛的制度限制,这不利于激进右翼议员的党团内部合作,也不利于其开展跨党团合作(即1→3路径)。然而,此类政党更加关注国内利益和议会内制度激励,能够促使激进右翼政党采取权宜合作以获取合法利益(即2→4路径)。总体上,激进右翼议员在个体特征与制度约束



影响下形成了非良性平衡。对于议员而言,这意味着对经费津贴等物质回报和国内政治的关注;对于议会制度而言,这确保了其内部秩序的稳定性的。

### 三 个体层面的观念动机与利益动机

传统上对欧洲议会议员行为的分析主要基于理性选择视角,即考察个体行为的预期成本与收益。然而,议员个体的行为往往是利益与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为观念能够塑造对利益的认知与界定,并调和议员个体的党团利益与国内利益。对于意识形态主张较为极端的激进左右翼党团而言,观念动机的作用甚至比利益动机更加显著。

#### (一) 观念动机

反对欧洲一体化的疑欧主义(Euroscepticism)被视为典型的观念动机载体,疑欧主义立场越强的党团参与欧洲事务的积极性越低。对激进左翼政党而言,欧洲一体化并不令人反感,同时也不是十分重要,因此它们在参与欧洲事务上比激进右翼政党的积极性更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激进左翼党团同时是欧洲一体化与欧盟的支持者,因为此类政党虽然支持欧洲议会的权力扩张,但对于欧洲一体化却没有类似的热情。<sup>①</sup>实际上,激进党团的疑欧主义可以划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对一体化进程本身的态度;二是对推动一体化的欧盟的态度。<sup>②</sup>右翼党团对这两个方面均持排斥立场。<sup>③</sup>其一方面反对一体化对国内经济和身份认同的威胁,另一方面则抵制欧盟行政权力对于国家主权的干预。正如玛丽娜·勒庞所说:“(我们)希望建立‘自由的欧洲民族联合’……在利益趋同时才进行必要的合作。”<sup>④</sup>这种主张在欧洲各国激进右翼政党中广受支持。<sup>⑤</sup>相比之下,激进左翼党团的情形相对复杂:既有支持一体化但反对欧盟的政党,也存在支持欧盟但反对一体化的政党(见图5)。那么,激进左翼党团的观念动机究竟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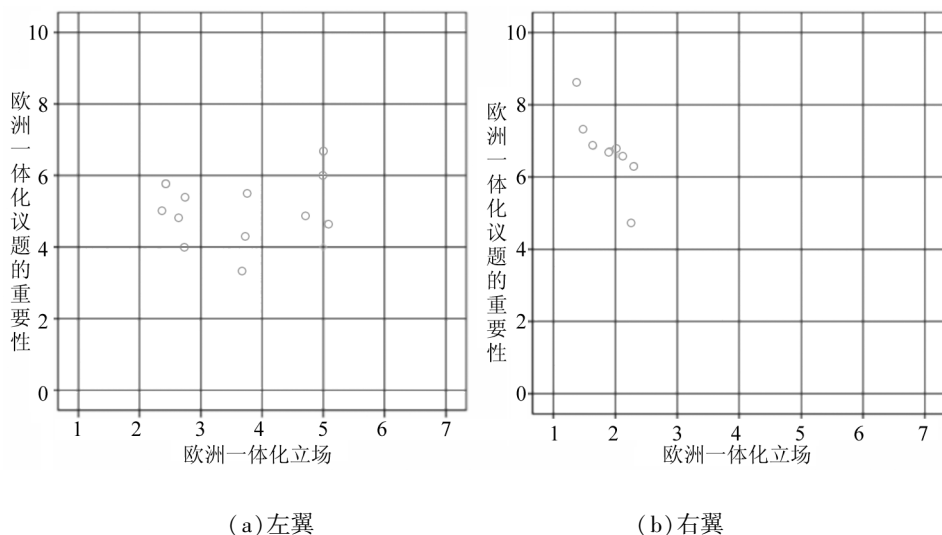
<sup>①</sup> See Harmen Van der Veer and Simon Otjes, “A House Divided against Itself: The Intra-institutional Conflict about the Powers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59, No.4, 2021, pp.822-838.

<sup>②</sup> Petr Kopecký and Cas Mudde, “The Two Sides of Euroscepticism: Party Positions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Vol.3, No.3, 2002, pp.297-326.

<sup>③</sup> 这一点可从本届议会认同与民主党团发布的党团条例中得到确证。参见 ID Group, “Statutes of the Identity And Democracy (Id) Group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2 July 2019, [https://d3n8a8pro7vnm.cloudfront.net/kantodev/pages/102/attachments/original/1582196570/EN\\_Statutes\\_of\\_the\\_ID\\_Group.pdf?1582196570](https://d3n8a8pro7vnm.cloudfront.net/kantodev/pages/102/attachments/original/1582196570/EN_Statutes_of_the_ID_Group.pdf?1582196570).

<sup>④</sup> “Le Pen Wants EU to Be ‘Association Of Free Nations’,” Euractiv France, 12 January 2022,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elections/news/le-pen-wants-eu-to-be-association-of-free-nations/>.

<sup>⑤</sup> “Orbán, Le Pen, Salvini Join Forces To Blast EU Integration,” POLITICO, 2 July 2022,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viktor-orban-marine-le-pen-matteo-salvini-eu-integration-european-superstate-radical-forces/>.

图5 第九届激进左右翼党团内政党在欧洲一体化议题上的态度<sup>①</sup>

资料来源:Seth Jolly et al., “Chapel Hill Expert Survey Trend File, 1999–2019,” *Electoral Studies*, Vol.75, 2022, pp.1–8.

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被认为是激进左翼政党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特征。<sup>②</sup>在这一思想传统的影响下,欧洲激进左翼政党间的跨国联络与合作不断增强。<sup>③</sup>因此,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并非对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持排斥态度,因为这从根本上与它们所固有的国际主义精神相违背。事实上,1994年7月,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色左翼联盟党团成立时发布的声明明确提出:“尽管内部存在分歧,但本党团作为一个整体将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但与它现行的方向有所不同。我们希望看到以充分民主体制为基础的一体化,优先致力于确保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以解决我们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我们想要一个基于完全团结的欧洲,以便使每个成员国的经济状况更加平等。我们反对最强大的国家把其政策强加于其他所有国家的企图。”<sup>④</sup>尽管融入部分民粹主义要素,该党团至今仍将以上原则作为其基本宗旨。<sup>⑤</sup>激进左翼党团反对的是欧盟及其制度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导向的一体化政策,主张的是一个在经

① 横轴数值越大,表明政党对欧洲一体化越支持;纵轴数值越大,表明欧洲一体化议题对于政党更重要。

② Luke March and Cas Mudde, “What’s Left of the Radical Left? The European Radical Left After 1989: Decline and Mutation,”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Vol.3, No.1, 2005, pp.23–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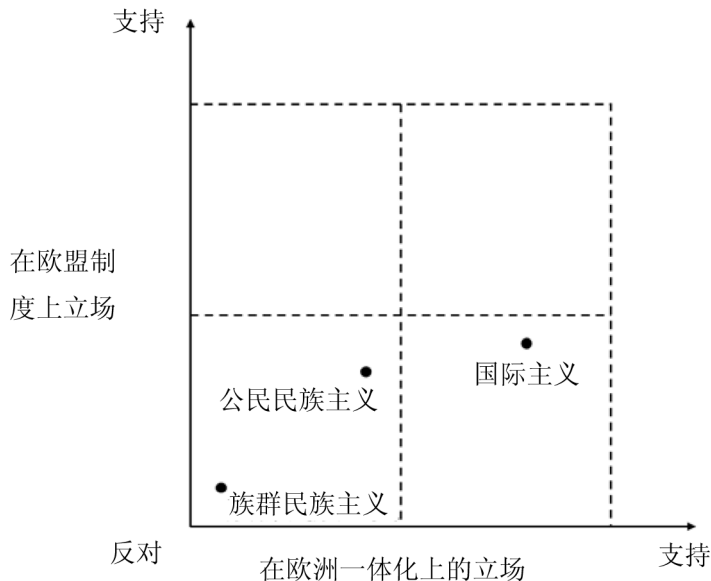
③ Luke March, *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 p.150.

④ The Left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Constituent Declaration—14 July 1994,” 4 January 2019, [https://www.guengl.eu/content/uploads/2019/01/040701-Constituent\\_declaration-1.doc](https://www.guengl.eu/content/uploads/2019/01/040701-Constituent_declaration-1.doc).

⑤ The Left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bout the Group: The Left,” <https://left.eu/about-the-group/>.

济上、社会上、文化上更加平等的欧洲,因而其一体化主张也被称为“选择性/批判性一体化”(Selective/Critical Integration)。即便是该党团部分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政党,也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而不是激进右党团所代表的“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sup>①</sup>由此,疑欧主义塑造了激进左翼党团的反欧盟制度倾向,而国际主义则促进了激进左翼党团的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倾向(见图6)。

图6 激进左右翼党团在两个疑欧主义维度上的立场



注:图由作者自制。

## (二) 利益动机

激进左右翼党团在疑欧主义上的立场可以概括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两类,由此形成了两派党团不同的观念动机,以及不同的利益动机。激进右翼党团对于欧盟及一

<sup>①</sup> 族群民族主义时常呈现出本土主义和排外主义(nativism)特征,主张单一民族的国家建构。参见 Cas Mudde,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A Pathological Normalcy,”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33, No.6, 2010, pp.1167-1186。相比之下,公民民族主义视阶级为主要的社会分歧,通过将国家类比为阶级,公民民族主义将“抽象的国际主义理想转化为对民族主义抗争的务实支持”,以对抗强大国家的压迫企图。参见 Tom Naim, “The Modern Janus,” *New Left Review*, Vol. 94, No. 1, 1975, p.22; 转引自 Daphne Halikiopoulou, Kyriaki Nanou and Sofia Vasiliopoulou, “The Paradox of Nationalism: The Common Denominator of Radical Right and Radical Left Euroscepticism,”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51, No.4, 2012, pp.504-539。

体化进程的极度排斥,加之族群民族主义的特征,导致该党团议员在权衡国际—国内利益时优先考虑国内利益,拒绝考虑在欧盟层面上提升职位或政策影响力的行动与机会,而将吸引国内选票和增强国内政治影响力作为首要任务。对激进左翼党团议员而言,其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使其即使排斥欧盟制度,却仍然将推动跨国层面合作视为自身任务,希图借此推动当前一体化方向的转变。激进左翼政党以公民民族主义巩固国内选民基础的同时,在欧盟层面相互合作推动更公平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由此可见,不同类型的观念动机塑造了个体的利益动机选择,从而倾向于将符合其观念的行为视为理性之选。因而,激进左翼党团的议员重视欧盟层面的利益等同于甚至高于国内利益,激进右翼党团的议员则优先考虑国内利益。

激进左右翼党团不同的利益动机影响了其在议会内的行为策略。激进左翼党团议员更重视欧盟层面的利益,因而在进入可供边缘力量发声的欧洲议会时,更看重这一跨国平台提供的职位利益和政策影响渠道,并寻求积极参与和融入欧洲议会。<sup>①</sup>对激进右翼党团成员而言,欧洲议会更多的只是其“政治表演”和获取国内政治资本的工具,<sup>②</sup>对于实质性参与议会事务及由之而来的跨国影响力并不感兴趣。因此,激进左翼党团和激进右翼党团成员往往分别扮演“实务派”和“演说派”。与此同时,激进左翼党团议员更多地因追求国际层面的一体化政策影响力而团结起来,加之其内在的国际主义合作传统,即使各国政党间出现分歧,也往往能够得到较好的协调与解决。相比之下,激进右翼党团议员主要是出于获取政治资源的目的而组织起来,其代表的国内族群利益是自身行动的基本准绳。当议会内部各国政党出现分歧时,冲突与矛盾甚至党团的解体就不可避免。正如费什(Catherine Fieschi)所指出的:“激进右翼政党自身的民族主义属性无疑破坏了其在欧洲议会内合作的可能性。”<sup>③</sup>这有助于解释激进左翼党团为何有更强的稳定性和内部聚合度。

表7显示在不同观念动机驱动下的利益动机,及其对激进左右翼党团成员行为的影响。可以看到,激进左翼党团支持一体化、反欧盟和偏好国际主义的立场决定了其

<sup>①</sup> 也有研究指出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政治抱负和议会参与行为的关系。这里的政治抱负本质仍属于利益动机。因此可以预期,意识形态更具国际主义色彩的激进左翼议员更有可能具有跨国层面的政治抱负,因而表现出更强的合作性参与行为。参见 Bjørn Høyland, Sara Hobolt and Simon Hix, “Career Ambitions and Legislative Participatio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lectoral Institu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9, No.2, 2019, pp.491–512。

<sup>②</sup> 比如,欧洲议会会向其内部的党团和政党拨付政治资金以为其政治活动提供经费支持,这是激进右翼党团内部政党政治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参见段明明:《欧洲极右翼政党对欧盟的“政治利用”策略透析——以法国国民阵线为例》,载《欧洲研究》,2017年第3期,第41–56页。

<sup>③</sup> Catherine Fieschi, “European Institutions: The Far-Right and Illiberal Politics in a Liberal Context,”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53, No.3, 2000, p.518。

追求跨国层面政治利益的动机,而激进右翼党团反一体化、反欧盟和偏好族群民族主义的立场形成其追求国内层面政治利益的动机。

表 7 激进左右翼党团的议会参与行为动因差异

	观念性动机	利益性动机	议会参与者
激进左翼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支持一体化、反欧盟</li> <li>· 国际主义与有限的公民民族主义</li> </ul>	欧盟层面的职位与一体化政策影响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务实合作</li> <li>· 团结一致</li> </ul>
激进右翼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反对一体化、反欧盟</li> <li>· 族群主义</li> </ul>	欧盟层面的选票、职位与政治影响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消极抵抗</li> <li>· 分歧重重</li> </ul>

注:表由作者自制。

#### 四 结构层次的制度约束

党团成员的议会参与行为除受到观念动机影响外,也受到制度环境因素的约束和鼓励。此类制度约束包括三类:政党内约束、党团内限制以及欧洲议会内的制度约束。激进左右翼势力在其中面临不同程度的约束,并为实现党团利益的最大化形成不同的参与策略。

##### (一) 政党内与党团内制度约束

在国内层面,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形成主要的制度环境。既有研究发现,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选举制度包括偏好投票制、单一可转移投票制,以及去中心化的政党候选人遴选制度,将导致议员更高层次的自主性;而以政党为中心的固定名单制和中央集权的政党候选人遴选制度,将导致议员对于所属政党的高度依赖。<sup>①</sup> 前者的制度条件给予议员在跨国层面上进行合作的更多空间,增强其合作倾向。然而,即便按照同一选举规则<sup>②</sup>在国内选出的激进左右翼政党议员,为什么在行为模式上差异甚大?除观念动机外,激进左右翼政党的内部制度结构同样发挥了显著作用。

<sup>①</sup> Simon Hix, "Electoral Institutions and Legislative Behavior: Explaining Voting Defection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World Politics*, Vol.56, No.2, 2004, pp.194-223.

<sup>②</sup>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欧洲议会选举制度在同一国家内相同,但各国间的选举制度不全相同。参见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Transnational Electoral Lists: Ways to Europeanise Elections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February 2021,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STUD/2021/679084/EPRS\\_STU\(2021\)679084\\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STUD/2021/679084/EPRS_STU(2021)679084_EN.pdf), p.25.

表8 激进左右翼政党内部制度比较

	最近一次大选得票率/%	政党民粹化程度	常设地方分支机构密度	政党基层活跃度	与重要社会组织机构联系度	政党候选人遴选分权度	政党领导人团结度	政党个人化程度
激进左翼政党	10.54	2.8	2.56	2.41	2.02	1.77	3.02	0.85
激进右翼政党	13.3	3.47	2.13	1.82	0.66	1.43	2.46	2.08

资料来源: Varieties of Party Identity and Organization (V-Party) Dataset。<sup>①</sup>

表8比较了激进左右翼政党的几项制度结构特征。由此可见,两派政党在“与社会组织联系度”与“政党个人化程度”两项指标上差距均大于1,在“政党基层活跃度”“政党民粹化程度”和“政党领导人团结度”三项指标上差距均大于0.5,而在“常设地方机构密度”和“政党候选人遴选分权度”两项指标上差距并不显著。这一结果得出三个推论:第一,激进左翼政党相比右翼具有更稳定的社会联系和制度基础;第二,激进左翼政党具有更团结的内部精英以及更低的民粹程度和个人化色彩;第三,政党候选人遴选制度对议员的议会参与积极性和团结度影响可能有限。由此可以预期,激进左翼政党具有更稳固的制度结构和选举基础,而激进右翼政党极高的民粹程度、松散的组织架构和不稳定的选举基础可能导致更高的选票流动性(Electoral Volatility)。<sup>②</sup>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法国国民阵线和意大利北方联盟(Lega Nord),以及2015年西班牙激进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力量党(Podemos)的选举表现佐证了这一观点。此外,激进右翼政党倾向于以移民等特定议题吸引选民视线,而此类议题的时效性较强,导致选民对其选举支持往往是昙花一现,<sup>③</sup>如2017年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的

<sup>①</sup> Varieties of Party Identity and Organization (V-Party) Dataset, <https://doi.org/10.23696/vpartydsv1>. 此处包含的激进左右翼政党指进入第六届至第九届欧洲议会并加入对应激进党团的政党,所有数值为平均值。除大选得票率一项外,其他各指标变动范围均为0-4,数值越高即与指标描述越契合。

<sup>②</sup> Kai Arzheimer, “Contextual Factors and the Extreme Right Vote in Western Europe, 1980–2002,”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3, No.2, 2009, pp.259–275; Gijs Schumacher and Matthijs Rooduijn, “Sympathy for the ‘Devil’? Voting for Populists in the 2006 and 2010 Dutch General Elections,” *Electoral Studies*, Vol.32, No.1, 2013, pp.124–133.

<sup>③</sup> Dmitriy Poznyak, Koen Abts and Marc Swyngedouw, “The Dynamics of the Extreme Right Support: A Growth Curve Model of the Populist Vote in Flanders–Belgium in 1987–2007,” *Electoral Studies*, Vol.30, No.4, 2011, pp.672–688.

选举表现即是例证。<sup>①</sup> 由此,激进右翼政党的政治行为表现出策略性、不稳定性和非连贯性。而此类政党较强的国内政治关切,使其在欧洲议会内的行为模式与国内选举类似。相比之下,激进左翼政党因国内选举基础更加稳固,在欧洲议会中的行为也相应稳定。<sup>②</sup>

尽管长期以来激进右翼政党的总体选举表现极不稳定,然而已有部分此类政党在长期发展中建立了稳定的政治存在,包括法国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意大利北方联盟、丹麦人民党、比利时弗莱芒利益党以及奥地利自由党等。<sup>③</sup> 以上政党大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制度,且长期在欧洲议会内占有席位。然而出于族群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对国内政治的优先考虑,此类政党并不总是选择加入同一党团。<sup>④</sup> 除此以外,由于议会程序规则对于建立党团所需国家和政党数量的限制,以及其他国家激进右翼政党极不稳定的选举表现,因而在议会内组建一个稳定的激进右翼党团难度极大。如以法国国民阵线为首的激进右翼政党,在第五届至第七届议会中试图建立稳定党团的目标均告失败,直到第八届议会中期才成功组建欧洲民族和自由党团。相对而言,激进左翼阵营内部的成员更加稳定,其成员长期稳定地来自十余个国家。在保持议会存在的激进左翼政党中,只有希腊共产党(Κομμουνιστικό Κόμμα Ελλάδας, KKE)在第八届议会选择脱离党团。

图7显示了激进左右翼党团在第六届至第九届议会中的成员变动情况。由此可见,激进右翼党团的成员分布集中,内部构成除少数政党外变动极大;激进左翼党团成员分布较为分散,且大多数政党长期保持议会存在。激进左翼党团的制度化水平显著高于右翼党团,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激进左翼党团内部成员的稳定程度高于右翼。同时,激进右翼党团议员在议会届中变换党团的行为更为频繁。一个内部成员不断流动变更的党团很难形成有效的制度规则,从而对其成员产生约束作用。第二,激进左翼党团成员的集中程度低于右翼,因而跨政党间的沟通程度更高。党团成员分布越集中,党团内实力分布越不均衡,跨政党间沟通协调越低效无用,导致内部规则制度

<sup>①</sup> 也有研究指出,部分欧洲国家(如德国、比利时等)出于对部分激进右翼政党的历史恐惧而选择在国内打压此类政党,导致其实力长期弱小。参见 Nicholas Startin, "Where to for the Radical Right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Rise and Fall of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Cooperation,"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11, No.4, 2010, pp.429-4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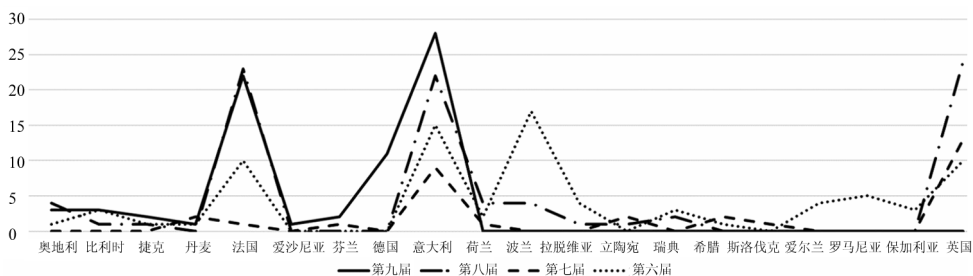
<sup>②</sup> 总体来看,激进左翼政党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转型较为成功地稳固了其选举基础。参见 Paolo Chiochetti, *The Radical Left Party Family in Western Europe, 1989-2015*, Routledge, 2016, pp.60-80。

<sup>③</sup> Reinhard Heinisch and Oscar Mazzoleni, *Understanding Populist Party Organiz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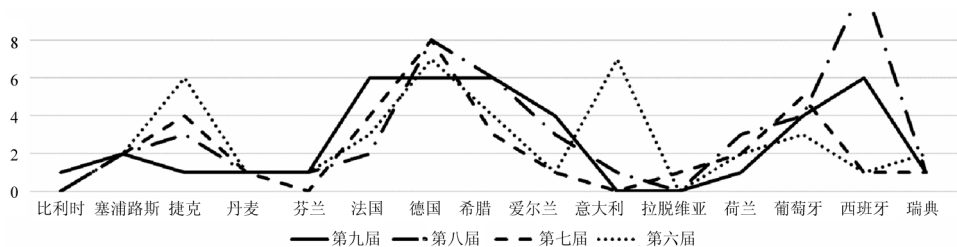
<sup>④</sup> Duncan McDonnell and Annika Werner, *International Populism: The Radical Right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p.30。此外,政党历史也影响了党团组建。由于法国国民阵线、丹麦人民党等过往较为极端的排犹主张,其他激进右翼政党总是试图避免与其发生联系。而这些政党则力图改善自身形象以获得更多接纳。

很难在成员中产生社会化作用。第三,议会程序规则要求每个党团保证最低限度的国家和政党代表性,激进右翼政党因较高的集中程度和内部流动性,难以维持最低限度的国家代表性,所以经常重组变更。可见,激进右翼党团较低水平的制度化意味着党团内部对于成员的约束力更低。而激进左翼党团议员面临的稳定环境为党团内制度化提供了较好的土壤,有助于其快速实现组织内规则的社会化,因而党团制度对于成员也有相应的较高度度的约束能力。

图7 第六届至第九届激进左右翼党团议员变动情况<sup>①</sup>



(a) 右翼



(b) 左翼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前述资料整理。

表9依据对激进党团议员个人的感受调查,佐证激进左右翼党团内部制度化水平的差异。由此可见,激进左翼党团比激进右翼党团的议员间沟通更频繁,党团对各自议员的行为约束更多,表明其内部存在更高的制度化规则和约束。<sup>②</sup>可以预期,激进

<sup>①</sup> 激进右翼党团在第六届包含欧洲民族联盟党团、独立与民主党团和“身份、传统与主权”党团三者,第八届包含欧洲自由和直接民主党团以及欧洲民族和自由党团两者。上述两图主要用于对比激进左右翼政党成员变动趋势,为更加显著表示出这一趋势的差异,两图采取了差异化纵向标尺,对结论并无影响。

<sup>②</sup> 但应注意,正如激进左翼党团的名称“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色左翼联盟党团”中的“联盟”(confederal)一词所暗示的,这一党团在保持一定制度性约束的同时,也给予其成员较大的自主性。



左翼党团内部更高层次的制度化水平在规范议员行为方面发挥了一定的聚合性作用,而制度化水平较低的激进右翼党团议员面临的约束相对较少,其行动模式更为发散和自由。<sup>①</sup>

表9 激进左右翼党团内部制度化水平对比

议会届数	与党团主席沟通频率		党团投票指示频率		党团内政党数量	
	激进左翼党团	激进右翼党团	激进左翼党团	激进右翼党团	激进左翼党团	激进右翼党团
第六届	1.65	3.05	3.88	2.06	25	24
第八届	2.17	2.54	3.09	2.00	12	13

资料来源: EPRG MEP Surveys。<sup>②</sup> 由于样本数量过少,第八届议会中的欧洲民族和自由党团未纳入统计。

可以发现,激进左翼议员更具国际主义合作精神,在组织内规则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更少的抗拒,而更多选择协商和调适的方法以适应规则,从而促进党团内制度化水平的提升。激进右翼议员坚持族群民族主义,与制度化过程所需的跨国合作、协商和调适不相容,即便形成了稳定的议会党团,也难以在党团内确立有效规则。所以激进右翼党团不仅缺乏提升制度化水平的客观环境,而且缺少从内部提升制度化水平的主观动力,使其党团约束力水平较低。<sup>③</sup>

政党内制度与党团内制度对于激进党团成员的影响表现在其制度化水平上:制度化水平较高的政党,选举基础更稳定。<sup>④</sup> 它带来两类结果:一是政党议员的政治行为更稳定,较少受选举波动影响,议会参与行为受国内因素制约较小;二是议会内党团构成更稳定,为党团制度化水平提升提供了稳定的基础,而较高的党团制度化水平又进

<sup>①</sup> 此外,较高的议员流动性(turnover rate),即较短的平均任期可能限制了党团制度化进程,参见 Shaun Bowler and Gail McElroy, "Political Group Cohesion and 'Hurrah' Voting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22, No.9, 2015, pp.1355-1365。笔者对此进行统计后发现,第六届至第九届议会中激进左翼党团议员的平均任期全部长于激进右翼党团,但差值较小。

<sup>②</sup> Simon Hix et al., "EPRG MEP Survey Dataset: Combined Data 2016 Release," <https://mepsurvey.eu/data-objects/data/>。对于“与党团主席沟通频率”一项,更低的数值代表更高的频率。“党团投票指示频率”指标则相反。两项指标的变动范围均为0至4。

<sup>③</sup> 此外,欧洲议会权力的扩张被认为带来了党团制度化水平的提升,但此处暂不考虑这一情形。参见 Amie Kreppel,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Supranational Party System: A Study in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pp. 39-51。

<sup>④</sup> Mogens Pedersen, "The Dynamics of European Party Systems: Changing Patterns of Electoral Volati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7, No.1, 1979, pp.1-26。

进一步规范了议员行为模式,增强其合作性。当然,对于部分拥有稳定议会党团构成的激进右翼政党而言,政党内制度和党团内制度对其约束较弱,议会内制度约束的作用则更加显著。

## (二)议会内制度与跨国合作

与许多欧洲国家的精英一样,欧盟政治精英长期对激进右翼势力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戒备。<sup>①</sup>例如,基于议会内委员会和代表团主席分配时依据的“德洪特规则”(d'Hondt method),<sup>②</sup>激进右翼党团本应在其中获得更多席位。然而,主流党团为避免这一结果出现,对激进右翼党团强制实行“隔离政策”,<sup>③</sup>使得激进右翼党团在议会领导层的影响力几乎为零,反映出激进右翼党团在议会内面临与激进左翼党团不同的制度环境。<sup>④</sup>加之激进右翼党团成员的族群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即使此类限制并不存在,激进右翼势力也难以在议会内团结起来。

然而,激进右翼党团在议会内又存在一定程度的稳定团结,在第五届至第七届议会中,激进右翼势力一直试图建立稳定党团,在第八届至第九届议会中该党团得以存续。那么,此类激进右翼政党如法国国民阵线等,为什么在具有极强民族主义的同时能够达成部分合作?实际上,这是因为欧洲议会内制度对此产生了显著影响。

欧洲议会内制度对于激进右翼政党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其挑战表现在对极度疑欧的激进右翼政党的种种限制,比如通过提高党团构成条件等方式来限制其形成稳定党团;<sup>⑤</sup>其机遇则表现在,一旦激进右翼势力挣脱此类束缚,则会获得与其他党团平等的待遇,比如在党团主席会议(Conference of Presidents)中的席位,更长的议会发言时间分配,以及更多的政治经费和津贴划拨。在此类制度收益的激励下,激进右翼政党即使面临严苛的制度限制,也存在主动寻求团结的动机,以满足自身需要并获得

<sup>①</sup> Nicholas Startin, "Where to for the Radical Right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Rise and Fall of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Cooperation,"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11, No.4, 2010, pp.429-449.

<sup>②</sup> 在该规则下,委员会和代表团主席按照各党团议会规模比例分配,这意味着即使是较小党团也有机会获得此类职位。有关该规则的具体说明及在欧洲议会内的实行,参见 European Parliament, "Understanding the d'Hondt Method," 28 June 2019,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9/637966/EPRS\\_BRI\(2019\)637966\\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9/637966/EPRS_BRI(2019)637966_EN.pdf).

<sup>③</sup> “隔离政策”(cordon sanitaire),即禁止激进右翼党团议员在欧洲议会内占有领导层席位如委员会主席/副主席、议会财务官、副议长等。所有其他党团在第九届欧洲议会伊始再度对激进右翼身份和民主党团(ID)采取了此类政策。参见 Agence Europe, "MEPs Apply Cordon Sanitaire Against Identity and Democracy Political Group," 10 July 2019, <https://agenceurope.eu/en/bulletin/article/12293/4>.

<sup>④</sup> Ariadna Serven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fter the 2019 Elections: Test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Cordon Sanitair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Research*, Vol.15, No.4, 2019, p.338.

<sup>⑤</sup> 在2010年发布的第七届议会议事规则(Rules of Procedure)中第30条规定,组成党团的最低要求由“五分之一成员国的至少20名议员”提高到“四分之一成员国的至少25名议员”。参见 European Parliament, "Rules of Procedure(7th parliamentary term)," 5 July 2010,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RULES-7-2010-07-05\\_EN.pdf?redirect](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RULES-7-2010-07-05_EN.pdf?redirect).

政治收益。<sup>①</sup> 合作由此成为激进右翼政党在议会内的权宜策略,尽管它们可能不会在各自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做出实质性妥协,也不像激进左翼党团那样在各类议题上均能达成广泛合作。

这一激励性逻辑同样适用于激进左翼政党。因为在欧洲议会中合作的潜在收益,对实力相对弱小和主张公民民族主义的激进左翼政党同样具有吸引力,加之其总体支持一体化的立场,使得激进左翼党团具有与其他主流党团对话合作的基本共识。可见,激进左右翼党团在欧洲议会内身处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其右翼势力会面临更多的约束。在行为策略上,激进左右翼党团均选择了党团内合作,然而激进左翼党团的选择是意识形态与制度奖励的结果,激进右翼党团的选择则是摆脱制度约束的权宜之法,合作本身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sup>②</sup>

在议会外的跨国合作层面,激进左翼势力似乎也保持着比激进右翼更为稳定和持续的联系。双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建立各类跨国合作联系,但两者的发展进程却并不相同。就激进左翼而言,欧洲新左翼论坛(Forum of the New European Left, NELF)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建立,并在2004年之后发展为欧洲左翼党(Party of the European Left, PEL)并稳定存续至今,成为欧洲激进左翼政党跨国交往的重要制度化平台。与此相反,以法国国民阵线为首的激进右翼政党于1997年成立的“民族欧洲”(EuroNat)组织,则因内部松散的结构和成员的矛盾冲突走向式微。其他激进右翼政党组建的跨国沟通渠道如欧洲直接民主联盟(Alliance for Direct Democracy in Europe, ADDE)、欧洲自由联盟(European Alliance for Freedom, EAF)等跨国性政党或选举联盟,则大多没有稳定的制度化联系,虽然其成员会议或首脑会议召开的频率颇高,却并未以协调彼此政策立场为目标,而是出于政治宣传和服务国内选民需求的考虑。<sup>③</sup> 这也对激进左右翼党团的议会内的合作行为产生影响,因为更多的制度化沟通渠道有利于增强信息沟通和立场协商。表10总结了激进左右翼政党面临的三种制度约束及其对两类政党议会行为的影响机制。

---

<sup>①</sup> 最重要的是欧洲议会所提供的政治经费数额。对于激进右翼政党而言,主流政党对其的敌视态度和自身较弱的社会组织联系导致在国内获得的政府经费资助和社会团体捐赠都非常有限。

<sup>②</sup> 激进右翼政党议员在议会内表现出的团结行为似乎表明其在议会制度约束下也完成了某种较低程度的社会化,但这将进一步带来其疑欧态度转变的说法已经为经验证据所否定。参见 Roger Scully, *Becoming Europeans? Attitudes, Behaviour, and Socialization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34-135。

<sup>③</sup> Duncan McDonnell and Annika Werner, *International Populism: The Radical Right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pp.185-187.

表 10 激进左右翼政党的制度约束及其议会行为

政党类别	A 政党内制度	B 党团内制度	C 议会内制度与其他跨国联系	议会行为作用机制
激进左翼政党	较完善的制度结构 较稳定的社会团体联系	议会存在较为稳定 党团内制度化水平较高	约束性与其他类型政党/党团基本同等水平 跨国联系中等	B 以 A 为基础促进合作 个体层面动机增强 B 作用 C 促进合作
激进右翼政党类型(一)	松散的制度结构 缺乏社会团体联系	议会存在波动较大 党团内制度化水平低	约束性更强 跨国联系弱	A 导致分裂 B 受 A 影响几无作用 C 促进合作
激进右翼政党类型(二)	较完善的制度结构 较少的社会团体联系	议会存在较为稳定 党团内制度化水平低	约束性更强 跨国联系偏弱	个体层面动机导致 B 几无作用 C 促进合作

注:表由作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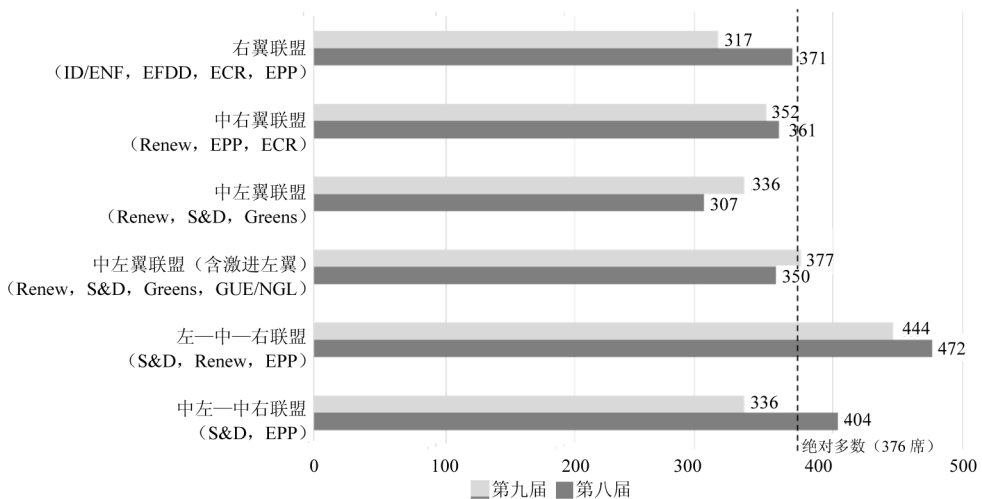
由表 10 可见,制度约束对激进左右翼政党行为的影响路径各不相同。对于激进左翼政党而言,三种制度约束都产生了促进团结合作的效果,而个体层面的观念动机甚至增强了这种效果。对于类型(一)的激进右翼政党而言,其选举根基孱弱、议会存在极不稳定,这导致其议会行为主要受议会内制度约束,党团内制度约束无论是客观还是主观均不现实。对于类型(二)的激进右翼政党而言,其拥有稳定的议会存在,因而党团内制度化水平的提升受限主要是个体层面观念动机所致。但与类型(一)政党一样,其同样受到议会内制度和跨国联系对行为的影响,使其仍然实现了较低水平的团结。总体而言,政党、党团和议会内三重制度都促使激进左翼政党议员表现出更强的议会内合作倾向,而对激进右翼政党议员而言,只有议会内制度是强迫合作的有效方式。

## 五 结论与展望

欧洲议会内的激进左右翼党团因所占席位少而缺乏讨论,对其利益偏好和参与策

略也缺少分析和比较。实际上,二者虽同属边缘激进党团,却有着不同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模式,并体现为双方议员非投票参与行为、投票行为、议会内政策网络关系以及党团变更情况四个方面。对比的结果表明,激进左翼党团有着比右翼党团更为积极和团结的议会内行为特征。究其原因,两类党团在个体层次的理念动机与利益动机的差异,以及面临的政党、党团和议会内制度约束的差异,塑造了双方不同的行为逻辑和策略。对于激进左翼议员而言,个体与结构因素的互动构成良性循环,进一步促进了议员的团结合作行为。对于激进右翼议员而言,个体与结构因素的互动呈现出更多的对抗性特征,然而在显著的政治收益驱动下,部分右翼政党仍可能采取合作的权宜之计。因而,激进左右翼党团的合作倾向或对抗策略,均为双方观念动机与制度约束的结果。当然,上述结论建立在可获得的经验事实之上,并非无条件适用于任何的案例与场景。同时限于议题和篇幅,仍有部分值得研究的议题尚未被充分讨论,包括但不限于三个方面:第一,欧洲议会权力的扩张使激进左右翼党团议员所处的制度环境发生动态变化,需要进一步解释其对激进左右翼党团的影响;第二,欧洲议会党团行为受到议员个人、政党属性、党团构成、国内政治和欧盟等多个层面因素的影响,对其行为差异的深层动因有待进一步研究;第三,激进党团在各层次上与主流党团的行为差异对比也将有助于发现影响其行为的特殊因素,同样有待后续的研究。

图 8 第八届和第九届欧洲议会内跨党团政策联盟对比



资料来源: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about-parliament/en/in-the-past/previous-elections>。

研究表明,激进左右翼党团为实现不同于主流党团的政治主张、排斥欧盟或欧洲

一体化,除了发起各类社会运动外,在欧洲议会中也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在既有研究所揭示的欧洲议会内党团行为普遍规律的基础上,上述发现深化了对欧洲议会不同党团行为的理解,明确了边缘的激进左右翼党团具体的策略选择逻辑,有助于加深对欧盟党团政治运作的认知。当前,欧洲议会内部激进右翼势力的持续崛起以及权力扩张,改变了欧盟内部的权力分配格局。在欧洲议会内部,激进右翼势力的崛起使得议会内跨党团政策联盟形成的难度加大(见图8),传统的中左一中右联盟(Grand Coalition)已无法在议会内确保绝对多数,而左翼和右翼政策联盟同样很难达到绝对多数。这意味着激进左翼党团的政治重要性有所上升,因为主流党团为形成政策联盟将不得不寻求其支持,使得针对激进右翼党团的“隔离政策”不可持续。从欧盟各机构间权力关系看,欧洲议会权力的扩张缓解了因欧盟的“民主赤字”部分导致欧盟委员会的相对弱势,<sup>①</sup>然而其致力于扩大公民社会参与的举措却无形中“引狼入室”,并可能加剧制度不稳定甚至影响一体化方向。<sup>②</sup>可以预见,欧洲议会内边缘激进党团的政治重要性将只增不减。

探究欧洲议会内边缘激进党团的行为模式及其可能动因,有助于增进对欧洲议会内不同政治力量及其影响的认识。《里斯本条约》之后欧洲议会权力扩展并在欧盟对外关系中发挥更大作用,<sup>③</sup>同时欧洲政党碎片化冲击了欧洲议会“共识民主”特质,因而调解欧洲议会内不同政治力量的主张冲突、增强欧洲议会民主包容性已经成为维系欧盟制度稳定的迫切议题。讨论欧洲议会权力扩张和内部构成变化这两种趋势,有助于研判欧洲议会内边缘党团势力的外交倾向变化,为相关决策提供经验依据。

(作者简介:董柞壮,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张睿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责任编辑:张海洋)

<sup>①</sup> 如“特别候选人”(Spitzenkandidaten)制度的实施,参见 European Parliament, “Stocktaking of European Elections,” 26 November 2020,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TA-9-2020-0327\\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TA-9-2020-0327_EN.pdf).

<sup>②</sup> 扩大公民参与是2021年4月至2022年5月召开的“欧洲未来大会”(Conference on the Future of Europe)的核心议程,但取得的成果有限。如其呼吁建立跨国选举名单(transnational electoral lists)制度的建议长期列在政治改革议程上,却从未得到实施。这部分源于欧盟政治精英对选举方式利好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恐惧。参见 EPP Group, “Why Transnational Lists Are neither European nor Democratic,” 2 July 2018, <https://www.epp-group.eu/newsroom/news/why-transnational-lists-are-neither-european-nor-democratic>.

<sup>③</sup> Martin Westlake, ed., *The European Union's New Foreign Policy*,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pp.107-120.